

从“生态自发”到“生态利益自觉”

——农村精英的生态实践及其社会效应

陈 涛

〔摘 要〕农村精英在生态农业发展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涂河蟹生态产业发展表明,农村精英的生态实践经历了从“生态自发”到“生态利益自觉”的形成过程:通过对既有粗放型养殖模式的反思和不同养殖模式的比较,他们最初具有了生态自发意识,而在一定的“环境—社会”系统内形成了生态利益自觉理念。当生态利益自觉成为普遍性的社会行为时,从自下而上的抵制污染产业到自上而下的预防污染都形成了一定的社会机制。在当前生态系统遭遇严重破坏的背景下,农村精英的生态实践及其社会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农村精英;生态自发;生态利益自觉;生态实践;社会效应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7BSH036);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项目(2009671034)

〔作者简介〕陈涛,1985年生,社会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政法学院讲师(山东 青岛 266100)。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2)02-0039-06

在当前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的背景下,如何破解经济发展与环境退化的二元悖论是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作为环境社会学的重要理论范式,生活环境主义强调从生活者的生活实际出发,根据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以及当地人的生活现状和生活智慧,进而寻找解决环境问题的答案。^{〔1〕}生活者也即既定区域的特定人群,其生产实践以及生态智慧对解决环境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在太湖流域和淮河流域的田野调查中发现,生活者的环境意识及其环境保护实践是在一定的“环境—社会”系统内形成的。本文以“中国生态养蟹第一县”——安徽当涂县的河蟹生态养殖产业发展为案例对此进行研究。

一、研究区域与研究问题

当涂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区位优势明显,仅靠长三角,毗邻南京,距离上海320公里。当涂“一山四水五分田”,水网密布并且相互贯通。境内盛产水产品,其中河蟹享有盛名。当涂河蟹作为一项产业的发展,则始于20世纪70年代,并经历了从粗放型“大养蟹”到生态型“养大蟹”的转型。其中,“大养蟹”是以蟹苗高密度投入、生态资源零投入为特征,最终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水域严重污染(水质由Ⅱ类、Ⅲ类恶化为Ⅳ类、Ⅴ类),水草和螺蛳等水生资源被破坏殆尽。水域生态系统的破坏加剧了河蟹产业的衰败,河蟹产业跌入低谷。2002年以来,经过水产专家的技术指导,

河蟹产业走上了以“种草、投螺、稀放、配养、调水”为主要特征的生态养殖之路。生态养殖不仅促使水产经济重新崛起,也促使水生资源和水域生态系统得到修复。目前,实施生态养殖区域的水质已经由Ⅳ类、Ⅴ类恢复到Ⅱ类、Ⅲ类,水域生物多样性指数明显上升。同时,随着河蟹养殖产业的发展,村集体经济得到壮大,医疗、养老、年终福利分配等社会事业均得到快速发展,初步走上了生态现代化道路。^{〔2〕}当涂生态养殖模式被称为水产“当涂模式”,农业部已在全国内陆区域推广这一生态模式。

水产“当涂模式”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条线路交汇的结果。就产业发展而言,“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发挥了关键功能,是生态产业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而从历史的时间渊源来看,“自下而上”的民间探索要早于“自上而下”的官方推动。从“自下而上”的视角来看,有两个问题值得深入分析。一方面是他们是对生态技术的采用,即民间社会最初是如何采用新型技术的。对此,早期人类学家就新技术发明被采用情况进行了很多研究^{〔3〕},社会学家则以技术“传播—采用”(diffusion-adoption)为主题进行专门研究。二是民间社会对生态养殖方式的探索。本文即是对农村精英有关生态模式的探索及其社会效应的研究。随着对水产“当涂模式”的深入研究,笔者发现,农村精英在产业转型和生态养殖实践中发挥着非常独特的功能。在特定的“环境—社会”系统内,他们



自觉的生态养殖理念的树立不但具有环境意义,也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本研究中的农村精英具有如下特征:(1)他们是社区中的少数人;(2)文化水平较高并具有一定的创新和技术革新能力;(3)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比社区中其他人要多;(4)具有一定的生态利益自觉意识;(5)在产业转型中发挥了引领功能。在某种程度上,这样一批特定的农村精英可被称为生态精英。

二、反思与比较中形成“生态自发”

精英人物的引领在生态转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没有这种精英,生态—经济双赢产业或社区就不可能出现。⁽⁴⁾早在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动生态养殖之前,就有一批土生土长的水产专家和农村精英在反思既有的养殖模式,并探索式地进行了生态型养殖方式试验。本文以其间的典型代表人物,兴村生态养殖第一人Y为例进行研究。在“大养蟹”导致河蟹产业陷入困境的时候,他率先探索以“种植水草、投放螺蛳”^①为特征的新型养殖模式,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为生态模式的推广和产业转型发挥了示范功能。

1. 资源与环境进入潜意识

在水系纵横的江南水乡,水就象是大自然的恩赐,俯拾皆是。利用水面进行水产养殖,几乎是所有水乡人的基本技能。20世纪80年代,当涂养殖户利用水资源养殖河蟹富了腰包,鼓了钱囊。据他们回忆,当时只要有水面,就肯定能赚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养殖户的知识结构中并没有生态意识,更不会有所谓的生态养殖理念与实践。尽管他们一直生活在特定的生态系统中,但并不知道“环境”究竟是什么?又能发挥什么功能?直到粗放型的养殖方式不但造成水域严重污染和资源严重破坏,还导致经济效益严重下滑、亏损(当时,亏损率达到90%左右)的时候,他们中的精英才开始觉得仿佛是哪儿出了问题。

农村精英Y是一个善于思考和勤于总结的人。通过对比20世纪80年代以来养殖水面的差异,他有了“水脏”和“水干净”这样的感官印象,有了水草丰富和水草匮乏这样的直观感受,最终形成了他的所谓的“灭绝性养殖”这样的术语称谓。在这种前后对比分析中,水草和螺蛳这样的“资源”概念和“水质”这样的环境概念进入了他的潜意

识。历时性的反思是新型模式产生的基础。在Y的比较框架中,因为靠水吃水,常年与水打交道使他懂得了水质保护的重要性。

2. 实践出真知:对比试验的开展

正如同马克思所说的,当工人以为自己的贫困是机器和厂房造成的,而并不了解其根源时,其最初的阶级斗争是以砸机器等形态为特征的自发斗争。农村精英对“生态”的认知也具有这种特质。在感到“灭绝性养殖方式”导致水体水草、螺蛳匮乏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将缺失的那些资源补齐。于是,他开始种植水草、投放螺蛳。但他这时并没有明确的生态意识,而只是基于经验比较后的探索性试验。笔者将这种基于生活经验初步形成的、尚不具有明确生态理念的浅层生态观称为“生态自发”。“生态自发”只是基于经验层次的认知,是一种感性认识。

1997年前后,农村精英Y就已经开始比较系统地进行水草和螺蛳培育,但并没有引起共鸣。周围养殖户认为花钱承包水面,不养河蟹而养水草的行为是亏本买卖,是不划算的。关于修补水体中的水草和螺蛳究竟是否是正确之路,他自己也并不明确,因为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三年后的对比试验,则让他坚定了信念。2000年,他承包了两个水面。一个是本村的10公顷水面,另一个外村的11.7公顷水面。两个不同的水面,水体资源和生态条件差别很大,本村的水面由于长期粗放式养殖,水质已经很差;而外村的水面水质相对较好,水体资源也比较丰富。在这两块生态条件本来差异就很大的水面,他实施了两种不同的养殖方式。本村水面由于承包期即将结束,他本人也没有继续承包的意图,采取的是和其他养殖户一样的粗放型养殖方式,而在外村水面中则尝试新型养殖方式。首先,投放螺蛳两万斤。其次,实施水面“抛荒”措施:他圈养了三公顷水面不养殖任何水产品而专门用来培育水草。按照Y自己的话语,因为那时候没有草种,这三公顷是实施生态养殖的草库,而“草库”当年培育出了120船金鱼草。这些水草全部投放在养殖水面中,平均每公顷水面分配10多船。经过一年时间,这种养殖方式就获得了成功,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而本村水面几乎没有经济效益。这种巨大反差,在养殖户中产生了巨大反响,他还被镇政府邀请做养殖经验报告。但是第二

^①“水草”和“螺蛳”是河蟹养殖能否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关键。一方面,它们本身是饵料——水草是植物饵料,螺蛳是动物饵料。另一方面,二者能够分解有害物质,调节水质。河蟹养殖中,不仅“蟹大小,看水草”,而且,“要想蟹病少,赶快种水草”。



9 771001 619003

年,由于过于“溺爱”水草,水草覆盖率过高,影响了河蟹的正常生长,导致养殖效益再次下降。这让他懂得了水草并不是越多越好的道理,于是又学会了控制水草。第三年,通过合理的水草覆盖,他再次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通过历时性和区域性的对比分析,特别是这个对比性试验,他在认识论层面豁然开朗:以前的效益之所以好,是因为水体中的水生资源丰富、水质清澈见底;现在养殖效益之所以差,是因为水生资源严重匮乏,水质受到严重污染。那么,如何才能振兴河蟹产业?这就是重视水域环境和资源的保护。具体地说,就是要改变以前的“人放天养”的、灭绝性养殖方式,实施以种植水草、投放螺蛳、降低放养密度、调节养殖水面水质的新型养殖方式。同时,在养殖中套养鳊鱼、黄白鲢等,进一步提高综合效益。用他的话语就是生态养殖要注意生态类的多样性及其量的合理搭配。比如,养花白鲢不仅是为了经济利润,也是因为他可以吃浮游动植物,是水体的清洁工。这种通过生物链促进生态平衡的养殖实践就是水产专家后来所总结出来的“种草、投螺、稀放、配养、调水”的生态养殖模式。

三、生态利益自觉的形成

农村精英在一定的“环境—社会”系统内逐渐由“生态自发”走向“生态利益自觉”,而当更多的养殖户形成“生态利益自觉”后,又促使了社会性的生态利益自觉机制的形成。生态利益自觉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在更大的系统内保护了水域环境。

1. 生态利益自觉的形成路径

在Y自己看来,他对资源以及生态的认知建立在学习经验基础上。从认知阶段上来说,经验是认知的感性认识阶段,是理性认识的初级阶段。知识结构中本来没有“资源”和“环境”这些元素,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后,这些元素进入潜意识(1997年前后)。随着2000年及其后续几年的试验,“资源”和“环境”由潜意识进入到意识层面。2002年开始,当涂县和有关科研机构开展系统的产学研合作,实施“河蟹振兴工程”,全国水产系统的专家纷纷前来宣传生态养殖理念、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他接触了大量的信息,确信了自己的探索是正确的。更重要的是,他明白了新型养殖方式的原理,生态认知完成了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进入到“生态利益自觉”阶段(图1)。“生态利益自觉”是有着明确意识、方向以及目的,能预期行动结果的理性认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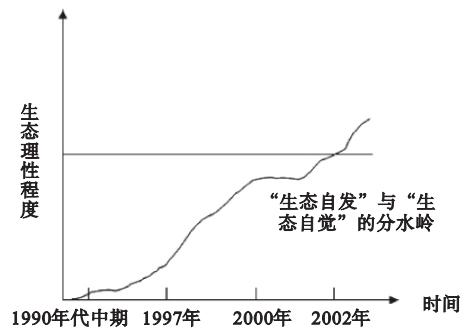


图1 农村精英的生态认知路线图

当然,这种“生态自觉”还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利益自觉”:自觉意识到生态或环境的“外部性”可以给系统(企业或社区)造成经济损失(成本)或带来经济收益。但“生态利益自觉”兼顾了人类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我”的利益与“我”之外的环境利益。(5)而景军所提出的“生态文化自觉”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从生态环境极度恶化转变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是一个认知革命和文化自觉均起到关键作用的过程。(6)笔者认为,生态文化自觉和生态利益自觉都是认识产业转型和生态转型的重要概念工具,它潜在地说明了地方文化和民间实践在产业的生态化转型中具有重要作用。生态利益自觉机制的形成,具有三个特征。一是源于蟹农自身的生存危机,即“靠水吃水”遭遇危机,从而引起反思性的生产实践与技术革新,环境意识也经历了从无知到自觉的转型。二是源于农村精英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有关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系统。不少学者在强调“日常知识”(ordinary knowledge)的重要性,即关于环境的实际经验和知识往往来源于日常生活体验。这种知识更多依靠的是对日常生活敏锐的观察和常识,而不是专业技术。这样的“日常知识”通过当地草根阶层的呼吸,饮水,耕田,采集林作物,在河、湖、海里捕鱼,而日积月累地形成。(7-8)就河蟹产业转型而言,生态精英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形成了一定的环境意识和价值判断,自觉意识到粗放型养殖的危害性以及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进而调试自己的养殖模式和环境行为,采取了与水域生态系统相对和谐的生产模式。三是以经济效益为核心。对生态精英而言,其生态利益自觉的确立是因为“靠水吃水”,是为了扭转养殖效益困境而不得不去反思的结果,是以追求经济效益为初衷和核心的资源环境观和行为模式。

“生态利益自觉”理念确立后,其行动的目的



性和方向性就十分明确,并能理性地预期到行动的结果。不仅如此,生态精英的生态自觉行为还对周边养殖户产生了积极影响。无论是他的试验效益还是积极尝试新技术的态度,都引导着左邻右舍对新型养殖方式的选择。

2. 农村精英的资源环境观

笔者曾于2008年1月、2009年8月中旬和下旬以及2010年9月前后四次对Y进行专访,每次访谈中,“资源”与“环境”这两个词都会不时地闪现,几乎是其话语体系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那么,他的资源环境观是什么样的?

简单地说,就是“要想赚钱就要先养生态”。农村精英的资源环境观就是由向资源和环境索取改为保护资源和环境,增进水域生物多样性。其中,环境指的是水质,就是水不能被污染。一旦水被污染,河蟹养殖必然亏本;而水质调节好是河蟹产业取得经济效益的基础。所以,河蟹生态养殖过程是“以水养蟹,以蟹保水”的过程。资源主要是水草和螺蛳等水生物资源,它们既是河蟹生长所必需的动植物饵料,更是水体清洁工和人工培育的水下生物系统。这些资源是环环相扣的,培养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是通过生物链原理促进水体自然的生态平衡。通过农村精英的生态养殖,水域环境得到修复,水域再次清澈见底,并能直接饮用。

3. 从“独木不成林”到“漫山遍野”

现在,虽然生态养殖已经是普遍性的行为,但在1997年以及2000年前后,很少有人会“种草、投螺”,因为这是“亏本买卖”。Y当时的感受是,那时的试验是“独木不成林”、“曲高和寡”,难以形成“气候”。

生态养殖成为普遍性行为最终还是在政府的推动下完成的。县和有关乡镇政府邀请中国科学院、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中国海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单位的水产专家前来进行技术指导和培训,并先后实施了“河蟹振兴工程”、“河蟹产业提升工程”、“水产技术人才提升工程”等。2006年,当涂县被农业部确立为“渔业科技入户”示范工程项目的实施县。通过这些财政政策和生态技术的支持,生态养殖最终形成蔚为壮观的场面。访谈中,农村精英也认为,其关于生态养殖的经验只是局部地区的实践经验。而水产专家前来调查分析后,经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所总结出的“种草、投螺、稀放、配养、调水”这套水产“当涂模式”具有更高的和更系统的价值。

四、生态利益自觉的社会效应

目前,生态养殖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从自上而下的视角来看,各级政府对生态养殖高度重视,予以多种政策支持,同时形成了一定的产业布局和预防工业污染的机制。从自下而上的视角看,普通养殖户将“生态利益自觉”付诸于生产生活实践中。而且,还内在地形成了一定的抵制污染以及污染产业的社会性机制。

1. 形成了合理的产业布局

当涂在以河蟹养殖为主要区域的农业区形成了“O”型生态农业布局(图2),范围内的六个乡镇主要发展生态养殖、绿色食品加工以及其它轻工业。这种产业布局也推动了政绩考核机制的改革。2005年,县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县河蟹生态养殖的意见》。《意见》除了明确规定生态养殖的任务和考核目标外,还将发展生态养殖列入乡镇经济发展计划和考核内容,建立了促进该项产业发展的考核指标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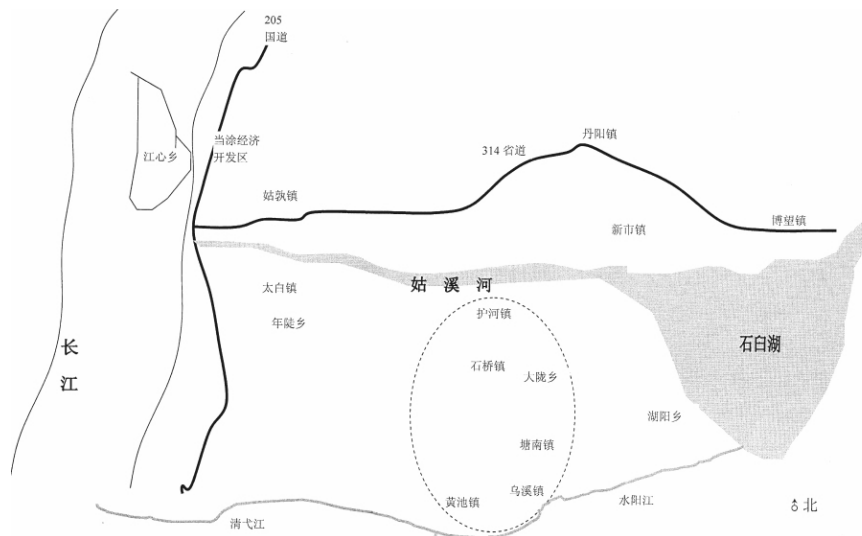
这种产业布局规划为因势利导地将河蟹产业做大做强提供了制度空间。直接理解其这一点可能并不深刻,而通过比较研究,其深层价值更明显。比如,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苏南地区也是久负盛名的鱼米之乡,无论是水面面积,还是发展水产经济的基础和优势都远远好于当涂县。但是,改革开放以来,苏南工业经济占据绝对强势地位,而水产经济被边缘化,处于弱势地位。苏南的产业规划为给工业经济发展提供了充分空间,而水产、水稻等传统的优势产业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压缩。2007年太湖蓝藻事件后,河蟹养殖、水稻种植等传统优势产业遭受新一轮的压缩。从国家或者更大的系统视角来看,工农业的合理布局意义重大。在当前工业化遍地开花的背景下,如果全国都能因地制宜地规划产业布局,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就可限制乃至遏制工业经济的畸形发展,也有利于从源头上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2. 形成了预防工业污染的机制

在全国“招商引资”忙得不亦乐乎的社会背景下,当涂县也不可能规避这种发展路径。县委和县政府明确将“招商引资”作为所谓的“一号工程”,并要求全力以赴地进行招商引资,引进工业项目。但是,生态养殖产业的经济和环境效益使得深入推进生态养殖产业发展在当地达成共识,并形成浓厚的社会氛围。而这又促进了政府部门在招商引资中预防工业污染。这种社会氛围促进了乡镇政府



9 771001 619003



注释:粗线“T”型表示的是重点工业布局,虚线“O”型表示的是生态农业布局。

图2 全县工农业经济布局^①

明确发展方向,并加强了对招商项目的环境评估力度,坚决限制污染企业的进入。这是预防工业污染的重要机制。

3. 推动了机制改革,提高了村民的环境意识

生态养殖需要一个过程,如果承包期过短,养殖户担心“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并很可能会因为时间短而不愿意实施生态养殖。特别是,如果竞标到的水面水质不好,那么,水环境的生物修复一般就需要一年时间,养殖户实施生态养殖的积极性就不会很高。为改变这种境况,当地政府积极推动相应的机制改革,而改革或曰创新后的机制更好地保护了水资源,促进了生态产业发展。

首先,延长水面承包期限,承包期由三年改为五年。2003年开始,塘南等乡镇率先将承包期由过去的三年延长至五年。在五年承包期制度下,养殖户基本可做到“一年投资,四年受益”(2009年8月26日访谈资料)。其次,水面承包采取了具有现代性的竞标方式。这些政策的出台,解决了养殖户的后顾之忧,也激发了养殖户的承包热情和投资力度,促进了生态产业的发展。而与此同时,生态养殖让村民亲身体会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进而提高了村民的环境意识,增强了其环境保护的自觉性,这有利于建构现代意义的生态公民。⁽⁹⁾

4. 形成了抵制污染的社会性力量

当涂虽然没有民间环保组织(NGO),但并不缺乏抵制污染的社会性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这种

社会性力量的产生源于生态产业的发展。塘南镇政府由“招商引资”发展珍珠蚌产业,转而取缔该项产业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该镇有一块将近19公顷的水面,之前是镇政府通过招商引资,请浙江客商在此养殖淡水珍珠蚌。但是,珍珠蚌养殖造成了严重的水污染问题。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珍珠蚌生长过程中需要大量浮游生物,只有水越肥,浮游生物才会越多。所以,为了养殖效益,养殖户大量投放畜禽粪便等有机肥,造成水域严重富营养化。二是养殖过程中仅仅是珍珠蚌这种单一的水产品,没有其它水生物调节失衡的水环境。这不仅造成水域生态环境破坏,而且影响了周边居民的生活。在此背景下,河蟹养殖户纷纷向镇政府反映污染问题,请政府部门重视。最终,镇政府在“民意”的要求下采取措施,取消了珍珠蚌养殖,并规定以后不再发展这项产业。同时,将水面发包,通过生态养蟹、种植水草等生物措施修复该水域生态条件(2009年8月26日访谈资料)。可见,关于珍珠蚌养殖,政府在民意的力量下经过了从“招商引资”到“禁止养殖”的转变。取缔珍珠蚌养殖,是镇政府基于民众意志的表达,综合考虑当地经济发展而作出的决策。另外,河蟹养殖户所组建成立的河蟹生态养殖公司、协会等组织,也有助于形成罗吉斯等人所称之的 Farm Pressure Groups,即农业压力集团⁽¹⁰⁾,从而和工业化的利益集团形成对抗性的组织力量,更好地抵制工业污染。

^① 图资料来源:陈涛《1978年以来县域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以当涂县为个案》,《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五、结论与讨论

当涂生态养殖产业的发展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农村精英和政府、水产专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农村精英是一个社会群体，从“生态自发”到“生态利

表 1

生态自发与生态利益自觉的基本维度

生态自发	生态利益自觉	
认识论范畴	经验主义(Empiricism)	理性主义(Rationalism)
认识阶段	感性认识	理性认识
路径方向	不是很明确 不断探索中	方向性明确 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计划性
与外力关系	没有受到或很少受到外力影响	受到政府和水产专家等外力引导
结果预期	不能或者难以预期结果	能预见到生态养殖的结果
行为群体	个体的、分散的	群体性、普遍性

态自发阶段属于经验主义(Empiricism) ,而生态利益自觉则是理性主义(Rationalism) ; (2) 在对生态养殖的认识阶段上 ,前者是感性认识阶段 ,后者是理性认识阶段; (3) 在如何实施生态养殖的路径方向方面 ,前者没有明确的路线 ,处于不断的试验和探索过程中 ,而后者已经懂得了基本机理 ,有了明确路径和方向 ,并懂得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相互制约关系 ,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计划性; (4) 与外力的关系方面 ,前者几乎没有受到或者很少受到外力的影响 ,是农村精英在一定的“环境—社会”系统内自发产生的行为 ,后者则受到政府和水产专家系统的引导; (5) 在对新型养殖结果的预期方面 ,前者由于没有可供借鉴的直接经验 ,处于试验中 ,不能预期结果 ,而后者则能预期结果; (6) 从生态养殖群体来说 ,前者是分散的、少数农村精英的个体行为 ,后者则是普遍性的群体行为(见表 1) 。当前 ,以水污染为代表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十分严重 ,严重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农业是弱势产业 ,很多地方为了追求 GDP 不顾一切地发展工业经济 ,不但限制压缩了农业的发展 ,也带来了灾难性的生态难题。长此以往 ,不但会遭遇“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 ,也会遭遇“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 。因此 ,当涂农村精英在河蟹产业发展中形成的生态利益自觉及其社会效应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当然 ,这需要农业产业形成特色并达到一定的规模 ,否则弱势的农业还是难以与

益自觉”的探索路径是当地一批民间精英对生态养殖模式探索路径的写照。

笔者从认识论、认识阶段、路径方向、与外力系统的关系、对结果的预期以及行为群体等六个方面对二者进行分析阐释。(1) 从认识论范畴来说 ,生

强势的工业相抗衡。因此 ,在当前生态环境遭遇严重困境的时期 ,这既需要基层农村精英和普通民众的生态利益自觉 ,也需要政府部门在合理规划工业布局 and 政绩考核机制方面形成生态利益自觉。

(参考文献)

(1) 鸟越皓之《环境社会学》,宋金文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第 50-51 页。

(2) 陈涛《生态现代化视角下皖南农村发展的实证研究——兼论当代中国生态现代化的基本特征》,《现代经济探讨》2008 年第 7 期。

(3) Buttel, F. H., Larson, O. F and Gillespie, G. W. , *The Sociology of Agriculture*,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0, pp. 46.

(4) [5] 陈阿江《再论人水和谐——太湖淮河流域生态转型契机与类型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9 年第 4 期。

(6) 景军《认知与自觉:一个西北乡村的环境抗争》,《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年第 4 期。

(7) 汉尼根《环境社会学》(第二版),洪大用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 72-73 页。

(8) Hannigan, J. A. 2006,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 Social Constructionist Perspectiv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 68-69.

(9) Dobson, A. , *Citizenship and the Environ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0) Rogers, E. M. and Burdge, R. J. et al. , *Social Change in Rural Societies* (3rd ed), New Jersey: Prentice - Hall, Inc, 1988, pp. 236.

【责任编辑:刘瑞弘】

